

## 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的「祭孔禮樂之改進」

水口拓壽 (MINAKUCHI Takuju)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助教

### 第一節 「道統」與「治統」

對於所謂「孔子廟」的典禮設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氏曾指出：「它爲『道統』的有形化身；另一方面，卻受制於代表『治統』的人君。其在歷史上的興衰起伏，正是它介於『道統』與『治統』之間，有以致之。」<sup>1</sup> 以本文的趣旨易言之，此話的意義就是：孔子廟及在其中舉行的「釋奠」典禮，作爲將政權所認可的「正當的儒教文化（史）」加以視覺、聽覺表現來宣傳其政權之正統性的裝置。每當政權所標榜的「正當的儒教文化（史）」更迭，或政權本身更迭之際，孔子廟這個「硬體」以及釋奠這個「軟體」亦隨之產生了更新、變化。當孔子廟改制之時，辨別在當時的儒教思潮上及當時之政權的統治理念上「正當的禮樂<sup>2</sup>」與「錯誤的禮樂」，以及辨別應當繼承的「來自往時正統政權的傳統」與應當排除的「來自往時非正統政權的傳統」，向來理所當然地成爲基本的態度。

以下以臺灣一九六八至七〇年（民國五七至五九）<sup>3</sup> 實施的孔子廟改制，根據上述觀點試探其內容與歷史背景。

### 第二節 孔子廟及釋奠典禮的概要

孔子廟是以被視爲儒教鼻祖的孔子爲主要祭祀對象的廟，在傳統上又稱「孔廟」、「文廟」、「聖廟」等。不限臺灣，在前近代創立的孔子廟多是官立文教機關的附屬設施，如位於北京的國子監、漢城（今稱首爾）的成均館、江戶（今稱東京）的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等，皆爲臺灣地區以外附設孔廟之文教機關。

孔子廟的空間佈局及其殿宇的名稱，曾經過歷史上的多次變遷。鑑於中國清朝的孔子廟制度<sup>4</sup>（尤其一八五七年〈咸豐七〉以後的）對亞洲各地之孔子廟曾有很大的影響力，姑且以它爲例說明：其中央有「大成殿」，以「至聖先師」的名義供奉孔子，還以「配享」（或稱「配祀」、「配侑」）的待遇供奉「四配」（復聖顏子、宗聖曾子於

1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1994，臺北：允晨文化出版）163頁。

2 本文以「禮樂」一詞統括儀式過程、禮器、衣冠、音樂、舞蹈等。

3 本文所標示的歷史年代一律並列「當時在現地使用的年號」與西元年。

4 本文以「孔子廟制度」一詞統括其營運方式、空間佈局、殿宇名稱、祭祀禮樂等。

東側，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於西側），以「從祀」的待遇供奉「十二哲」（先賢閔子損、先賢冉子雍、先賢端木子賜、先賢仲子由、先賢卜子商、先賢有子若於東側，先賢冉子耕、先賢宰子予、先賢冉子求、先賢言子偃、先賢顓孫子師、先賢朱子熹於西側）；大成殿的左右有稱「東廡」、「西廡」的長型建築物向前方伸長，在其中以「先賢」、「先儒」的名義供奉與孔子同時代至後世的許多儒者。大成殿的後方有稱為「崇聖祠」的附屬設施，供奉孔子的祖先五代、孔子之兄長、四配及六位宋代先賢先儒的父親。神位一律使用木主（即木製牌位），而不用神像。<sup>5</sup> 孔子廟就算是以木材、石材、金屬材於三次元的世界畫出的「正當的儒教文化」之曼陀羅，<sup>6</sup>也算是「正當的儒教文化史」之年表。

在孔子廟舉行的典禮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釋奠」。該典禮以「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禮記·文王世子篇》）為儒教經典上的根據，於「舊曆」仲春、仲秋的上丁（即該月內第一個「丁」日）執行為慣例。<sup>7</sup>釋奠的儀式過程由許多分段構成，其中通時性的變遷（由時代之不同而產生的差異）及共時性的異同（由地域之不同所產生的差異）都不少，但其核心部份可分為下列的四階段：

- 迎神——迎接孔子的神靈進入典禮空間內。
- 三獻禮（「初獻禮」、「亞獻禮」及「終獻禮」之總稱）——奠酒，獻帛。初獻禮結束之後，再以主持者的名義呈上一篇「祝文」。
- 飲福、受胙——以將供品中的酒、肉入口的行為，象徵人與神靈共食。
- 送神、望燎——送別神靈至典禮空間外，再焚化祝文、供品以送到神靈之所在（即天空）。

其參與人員的核心部份可分成下列的五群：

- 主獻（或稱「主祭」、「正獻官」等）——升入孔子廟的中樞大成殿，以對於孔子一位進行三獻禮。三獻禮既有由一人擔負的方式，亦有由數人分擔的方式，但總而言之，整項典禮的主持者親自擔任初獻禮。

5 中國早在一五三〇年（明嘉靖九）規定廢除神像，只用木主。但也有採用木主以後仍用神像，二者並存的事例，如曲阜孔廟。關於包含孔子廟制度大幅度變更的「嘉靖禮制改革」全貌，請參閱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125-163頁；小島毅，〈嘉靖の禮制改革について（關於嘉靖禮制改革）〉（《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7冊，1992，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6 以佛教文物比喻孔子廟之事也許失當，但筆者想不出其他更適合的修辭。請原諒筆者的語彙貧乏。

7 照字面解釋，「釋奠」就是「擺設供品」之意，其字義本來不限於「對於孔子的祭祀典禮」。譬如，早在孔子廟設立之前（即唐朝初年），曾有一項典禮以《禮記·文王世子篇》中之同一節為根據而舉行，其中以「先聖」的名義祭祀周公，以「先師」的名義配享孔子。在此典禮之中，周公作為居孔子之上位（比孔子更主要的地位）的祭祀對象。

- 分獻（或稱「分祭」、「分獻官」等）——必由數人組成，各自升入大成殿、東廡或西廡，以對配享級的祭祀對象或從祀級的祭祀對象進行三獻禮。
- 禮生（或稱「執事」等）——必由數人組成，擔負迎神、送神、啓扉（即開門）、闔扉（即關門）等分段。另有一群稱為「引贊」，各自陪伴主獻、分獻等人員，逐一指示典禮空間中的動線，以及儀式中的行儀。
- 樂生——必由數人組成，擔負音樂（器樂及歌唱），在迎神、送神、三獻禮等許多分段提供伴奏。
- 佾生（舞生）——必由數人組成，主獻、分獻進行三獻禮時，於大成殿正面擔負「佾舞」。佾舞除有只用「文舞」的方式，也有輪替呈獻「文舞」及「武舞」的方式。

上述的儀式過程及參與人員之構成，並非孔子廟釋奠典禮特有的，與其他對於天神、地祇、人鬼的儒教典禮在基本上是共通的。



臺北市孔廟（舊稱臺北孔子廟）的大成殿。  
已陳設樂器及裝飾，以預備釋奠的狀態。二〇〇三年攝。



臺北市孔廟的釋奠於九月二八日上午六時開始，在儀式的進行中，天色漸亮。

位於圖右的建築物是大成殿，其後的長型建築物是西廡，  
最後面的水泥建築物是「明倫堂」（附屬於孔子廟的講堂）。二〇〇三年攝。

### 第三節 臺灣一九六八至七〇年的孔子廟改制（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孔子廟

臺灣於一六八三年（永曆三七，康熙二二）被納入清朝統治之後，各地陸續創立了官立的孔子廟。清朝所制定的孔子廟制度，在一八九五年（光緒二三，明治二八）臺灣割讓給日本後仍被沿襲，一九四五年（昭和二〇，民國三四）的「光復」（即日本統治期間終了）以後也仍然持續。勉強說來，清朝統治期間，舉行釋奠時穿戴的衣冠當然是清朝所規定的祭服，日本統治期間以後（各地的孔子廟由民間團體存續）改為屬於民間禮裝的「白長袍、黑馬褂」等了。雖然清朝於一九〇六年（光緒三二）將釋奠在國家性祭祀典禮之體系中的地位自「中祀」級提升為「大祀」級，<sup>8</sup>但此時的釋奠改制並未影響當時已經離開清朝統治期間的臺灣孔子廟。<sup>9</sup>

成立於中國大陸的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三）將「新曆」八月二七日制定為「孔子誕辰紀念日」之後，<sup>10</sup>由中央政府與各院、各部代表於曲阜舉行一項「隆重典禮」，<sup>11</sup>翌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四）將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的嫡系裔孫分別任命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復聖奉祀官」、「宗聖奉祀官」、「述聖奉祀官」、「亞聖奉祀官」，<sup>12</sup>足見國民黨政府於「遷臺」（即遷移至臺灣）之前就十分重視孔子廟與祭孔典禮。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八）國民黨政府遷臺以後，開始派遣「總統代

8 自隋代以來，國家性的祭祀典禮以被分成「大祀」、「中祀」、「小祀（或稱『群祀』）」的三等為常例。於孔子廟舉行的釋奠，在升級為大祀以前的約一四〇〇年中，被列入中祀的期間占多半。

9 上述的臺灣孔子廟之歷史，是根據黃文陶編著，《中國歷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禮考》（1965，嘉義：嘉義縣文獻委員會）108-195頁；黃得時編著，《臺灣的孔廟》（1981，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以及杜美芬，《祀孔人文暨禮儀空間之研究—以臺北孔廟為例》（2003，中壢：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1-232頁等記述的。

10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3冊（198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371頁。孔子的誕辰古來有諸說，其中舊曆八月二七日出生之一說曾經被清朝採納。國民黨當時將新曆八月二七日規定為孔子誕辰紀念日的理由，筆者不知是否沿襲此數字。

11 當日於曲阜孔廟接連舉行「國祭（公祭）」與「家祭」，然後於孔子墓前再舉行「謁陵典禮」。國祭與謁陵典禮，都是由中央政府所派遣的葉楚傖氏擔任「主祭」。家祭由當時擁有「衍聖公」地位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嫡系裔孫孔德成氏主祭，以動員八佾舞（文舞與武舞）的釋奠形式舉行。以上記錄見於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3冊393頁；以及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至十二月份（1988，新店：國史館）291-293頁。此外，中野江漢，《釋奠》（1935，東京：東亞研究會）33-34頁報告：當日「全國一齊に盛大なる釋奠の式典を舉行した（全國一齊舉行盛大的釋奠典禮）。」

12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3冊433、489頁；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至六月份（1987，新店：國史館）56頁；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七至十月份（1990，新店：國史館）39-40頁。值得注意的是，子思子自己也相當於孔子的嫡孫，故子思子的嫡系裔孫必定也是孔子的嫡系裔孫。此時就任的孔姓奉祀官只有一位（孔德成氏，即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筆者因此推測，當年述聖奉祀官由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兼任，或姑且空缺。



表」出席臺北孔子廟的釋奠典禮。一九五一年（民國四〇），之前運營臺北孔子廟的民間團體「臺北崇聖會」被廢止，由新設立的「臺北孔子廟管理委員會」取代。<sup>13</sup>雖然該會也是一個民間團體，但其主任委員由臺北市長兼任。一九五二年（民國四一），孔子舊曆的生年月日（周靈王二一年八月二七日）被換算成新曆九月二八日，於是孔子誕辰紀念日由總統令自新曆八月二七日移到九月二八日，之後一九六〇年（民國四九），國民政府重新宣布：當年值孔子誕生後二五一〇週年，即孔子生於新曆公元前五五一年九月二八日。<sup>14</sup>

不久，共產黨政府於中國大陸開始「文化大革命」以後，對岸的國民黨政府也開始在意識型態上與之對抗，一九六六年（民國五五）國民黨政府在臺灣展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中「堯→舜→禹→湯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統」被認為是由「國父」孫文（孫中山）所繼承的，「中華文化」被並認為是由孔子達成初度集大成以來，由孫文所提倡的三民主義成就了再度集大成，如此的言說顯然包含了維護「我五千年來傳統優秀之文化」，以強調彼我差異的意圖。<sup>15</sup>因此儒教文化之振興被視為「中華文化之復興」的核心。

在如此的趨勢之中，領導國民黨政府的蔣中正（蔣介石）總統於一九六八年（民國五七）二月二二日以手諭指示：「對於孔廟雅樂，祭孔之樂器、舞蹈、服裝之製作與研究，應加以注重，以恢復我國古有禮樂之基礎」。<sup>16</sup>教育部文化局基於此手諭，於九月一〇日招集內政部、臺灣省政府的民政廳與教育廳、臺北市政府的民政局與教育局等機關，及孔德成氏（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蔣復聰氏（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莊本立氏（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專攻音樂史）等人，組織「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sup>17</sup>新制的釋奠於同月二八日在臺北孔子廟登場，典禮的前一天蔣總統親自到場視察「習儀」（即排

13 清朝統治期間創立的「文廟」在日本統治期間的初葉被撤去，一九三一年（昭和六）由民間團體「臺北孔廟建設籌備處」，以「臺北孔子廟」的名稱於現址重建。

14 徐金虎編，《禮俗宗教法令》（1969，臺中：瑞成書局）31頁「考証孔子誕辰」項。此時期的臺灣孔子廟之歷史，亦是根據注9列舉的文獻記述的。

15 蔣中正，〈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收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七至十二月份（1991，新店：國史館）858-860頁。

16 此是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970，臺北：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2頁「前言」所引用或要約的文本。蘇麗玉氏在《臺灣祭孔音樂的沿革研究》一篇中引用的文本與此不同：「祭孔之樂器、舞蹈、服裝之製作與研究，更應加以注意，並可派有研究之專員，向日本與韓國所有完整之機構與樂府，定期考察與學習，以恢復我國固有禮樂之基礎。」蘇麗玉，《臺灣祭孔音樂的沿革研究》（198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99頁。但很可惜地，筆者未能發現其原始資料。

17 自新制禮樂之制作至器具、衣冠之製造，以及儀式之排練的一系列準備過程，是不可能在僅一八天內完成的。蘇氏所引用之蔣總統手諭，其實包含「限一個月內提出初期報告，並可請蔣復聰院長及莊本立工程師亦參加其會議，共同研究是要。」的文字，以三月下旬為提交初期報告的期限。蘇氏於是陳述：「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包括考訂及製作樂器、服裝、訓練演奏及舞蹈，終於在五十七年九月廿八日清晨在臺北市的祭孔大典中，作了第一次的隆重演出。」蘇麗玉，《臺灣祭孔音樂的沿革研究》99頁。該委員會的前身或其實務小組，應該在九月以前已經開始活動。

演)。<sup>18</sup>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到一九七〇年(民國五九)為止,以於臺北孔子廟每年舉行的釋奠為實驗機會,陸續修訂儀式過程、禮器、衣冠、音樂、舞蹈等。王宇清氏(國立歷史博物館長,專攻服飾史)等也在中途加入了該委員會。最後,該委員會整理三年來的成果,編寫題為《祭孔禮樂之改進》的冊子。<sup>19</sup> 林勇成氏曾指出:新制的釋奠告成之後,翌年雖由內政部「公佈實行(一說試行)」,但其法令似乎對各地孔子廟沒有拘束力。<sup>20</sup> 但林氏並未舉出具體法令的名稱,並且《祭孔禮樂之改進》中也無相關敘述,但內政部曾以某種形式核定該委員會所制作之釋奠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因為臺北市孔廟曾於一九七〇年代將釋奠禮樂幾次小幅度變更時,大都預先獲得內政部的承認。<sup>21</sup>

一九六八年(民國五七)九月一八日,即第一次新制釋奠舉行直前,「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由行政院公佈,即日施行。其大綱是:一、於題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的九月二八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由最高行政首長主持舉行「紀念大會」(第二、三條);<sup>22</sup> 二、擁有孔子廟的地方,亦由各地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主持,「採用古禮祀孔儀節」,「主祭及與祭人員著用中式禮服」,於孔子廟舉行釋奠,即一項祭祀孔子的典禮(第二、四條)。<sup>23</sup> 此法令的出現,顯然需要從中華文化復

18 翌日蔣總統於總統府大禮堂主持「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千五百一十八週年誕辰典禮」後,在中山樓招待「四百多位大、中、小學資深優良教授教師」並對其訓話。其中講述:「看了祀孔典禮以後,愈益感覺到禮樂的感人之深。……對這一次改革後的祀孔典禮,摒棄了一般俗樂,而完全改用宮、商、角、徵、羽的群樂,是一大進步。」並提及共產黨政府「正在瘋狂的破壞中國文化,仇視孔子思想」的情況,要求教師們「共同致力於中華文化之復興」。《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九「演講」226-228頁,收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七至十二月份(2002,新店:國史館)331-332頁。

19 即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該書於2頁「前言」中簡潔敘述了自蔣總統指示孔子廟改制時至此時的經過。根據卷末的〈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名錄〉與〈各研究組名錄〉(無頁碼),該委員會其下有「禮儀研究組」、「服裝研究組」、「樂舞研究組」、「祭器研究組」四個小組,各別由方豪氏(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專攻中國史)、王宇清氏、莊本立氏、孔德成氏率領。但筆者不知,該委員會於何時解散了。

20 林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俗舞」之研究》(200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所碩士論文)73-34頁、90頁。

21 杜美芬,《祀孔人文暨禮儀空間之研究—以臺北孔廟為例》195-196頁。

22 其儀式過程由「唱國歌」、「向國旗及國父遺像、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主席報告」、「講述孔孟學說」、「奏樂(孔子紀念歌)」等分段構成。「孔子紀念歌」是以《禮記·禮運篇》中的一節(即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至「是謂大同」)為歌詞,加以洋式音樂的歌曲。一九三四年(民國二三)八月二七日,國民黨政府曾於首都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先師孔子誕辰紀念大會」,典禮當天,是將孔子遺像立於孫文遺像前舉行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至十二月份293頁。

23 《總統府廣報》一九九四號(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九月二十日)4頁,收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七至十二月份295-296頁。於臺北孔子廟(臺北市孔廟)舉行的釋奠典禮現在依然由臺北市長擔任正獻官,由市長對孔子進行三獻禮,其儀式過程另外包含總統於三獻禮之後上香,以自己名義呈上祝文的分段。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21-22頁。但二〇〇八年(民國九七)馬英九氏到場前,未有總統實際出席釋奠的前

興運動的脈絡上理解其意義，且釋奠時將「古禮祀孔儀節」與「中式禮服」的抽象規定（「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透過儀式過程、衣冠等加以明文化（《祭孔禮樂之改進》）以作為「中華文化復興」之具體表現方式。這抽象與具體的兩方面工程是同步進行的。傳統上，制定或更改禮制或具體實現禮樂之事是握有「中華」的政權才能行使權力，因此號令改制孔子廟，尤其釋奠禮樂的行為本身，在蔣總統的意識中，也許相當於主張國民黨政府就是正統之「中華」政權的行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所規定的義務項目，在後來於一九九三年（民國八二）九月訂定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要點」，及以「修正」的形式於二〇〇九年（民國九八）一〇月生效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奉祀及紀念要點」都傳承下來了，至今仍然有效。

一九七二年（民國六一），臺北孔子廟由國民黨政府接管，屬於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管轄，並將重建以來使用的名稱「臺北孔子廟」改為「臺北市孔廟」了。跟隨如此的動向，在臺中、高雄、桃園等未有孔子廟的城市，由市政府或縣政府運營的孔子廟也相繼地創立了。<sup>24</sup>

#### 第四節 臺灣一九六八至七〇年的孔子廟改制（二）—解讀《祭孔禮樂之改進》

本節以注目六個變數的方式，把握孔子廟制度變遷過程的梗概。即，(1)釋奠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2)給孔子追贈的稱號；(3)配享者、從祀者的明細與其配置；(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5)釋奠時所演奏的樂曲（音樂與歌詞）；(6)釋奠時所呈獻的佾舞。

針對上述的六個變數，筆者根據下面的三個來源：(A)《祭孔禮樂之改進》；(B)〔元〕《宋史》；〔明〕《（嘉靖）大明集禮》；〔明〕黃佐，《南雍志》；〔明〕李之藻，《頻宮禮樂疏》；〔明〕朱載堉，《樂律全書》等該書中所言及的文獻；(C)〔明〕《（萬曆）大明會典》；〔清〕《明史》；〔清〕《（乾隆）大清通禮》；〔清〕《（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民國〕《清史稿》等其他關於明清時代國家禮制的資料，比較了一五三〇年（明嘉靖九，即「嘉靖禮制改革」中的一環）、一七四二年（清乾隆七）、一九〇六年（光緒三二），以及一九七〇年（民國五九）所確定的孔子廟制度。其結果

例，於是以派遣代理人（即總統代表）的方式處理。連自己指示孔子廟改制的蔣總統，都只視察第一年份的習儀而已。一九八八年（民國七七）以來的歷任總統（即李登輝氏、陳水扁氏、馬英九氏）都有曾以臺北市長之資格擔任正獻官的經驗。

24 關於孔子廟在此等城市創立的過程，黃得時編著，《臺灣的孔廟》；傅朝卿主編，《閱讀臺灣的孔子廟—孔子廟與臺灣文化資產特展圖錄》（2002，臺南：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刊）等文獻中有詳細的記述。



如下：<sup>25</sup>

(1)釋奠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

明朝一五三〇年——中祀，佾舞六佾，盛裝孔子用之供品的籩、豆各一〇（到前一年為止，與大祀〈尤其祭天典禮〉同樣，佾舞八佾、盛裝孔子用之供品的籩、豆各一二。）<sup>26</sup>

清朝一七四二年——中祀，佾舞六佾，盛裝孔子用之供品的籩、豆各一〇。

清朝一九〇六年——大祀，佾舞八佾，盛裝孔子用之供品的籩、豆各一二。

臺灣一九七〇年——參考「宋明以來各種典籍」而規定「大祀八佾」。但現存的臺北孔子廟場地狹窄，無法動員八佾舞，因此將來改建臺北孔子廟前，止於「中祀六佾」。<sup>27</sup>關於盛裝孔子用之供品的籩、豆，沒明載其數量（在臺北孔子廟〈臺北市孔廟〉，到二〇〇七（民國九六）年為止各用一〇，只於二〇〇八年（民國九七）「重現大祀規模」各用一二。）<sup>28</sup>

(2)給孔子追贈的稱號

明朝一五三〇年——至聖先師（之前沿襲元朝的制度，規定「大成至聖文宣王」）。

清朝一七四二年——至聖先師。<sup>29</sup>

清朝一九〇六年——至聖先師。

臺灣一九七〇年——參考「宋明以來各種典籍」而規定「大成至聖先師」。<sup>30</sup>

25 於此列舉的是關於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孔子廟的制度，其他地方之孔子廟的規定不必相同。

26 獻給配享者與從祀者的供品，按照其等級降格且縮小。

27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9-20頁。於孔子廟改制後創立的高雄市孔子廟、臺中市孔廟等，突出於大成殿前面的丹墀（佾生奉獻佾舞的舞臺）修建得十分寬闊，因此創立以來即採用八佾舞。林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87-90頁。於二〇〇一年（民國九〇）與〇八年（民國九七）的釋奠，八佾舞也曾在臺北市孔廟登場，為此廟方將丹墀臨時擴大了。另外，《祭孔禮樂之改進》的同頁明載：只限孔子神位才併用神像與木主；將來臺北孔子廟改建後，應由總統或「總統之代表」主祭，但此等計劃至目前為止都未實現。

28 臺北市政府新聞稿〈紀念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五八週年誕辰 欣逢孔廟修復 神位陞座 釋奠祭禮傳承四〇週年 八佾八音十二籩豆隆重祭孔 有史以來第一位國家元首親自蒞臨上香 大龍峒文化季緊接登場，邀請大家參與儒家六藝文化宴〉（發稿單位：民政局，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六日）。

29 清朝曾於一六四五年（順治二）至五七年（順治一四）的極短期間採用了「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的稱號。

30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9-20頁。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與於二〇〇三年的釋奠獻給孔子的供品。  
排於圖右之細長的容器是「簋」，排於圖左之有腳容器是「豆」。

(3)配享者、從祀者的明細與其配置（於正殿與後面的附屬設施供奉）<sup>31</sup>

明朝一五三〇年——於先師廟<sup>32</sup>供奉四配、十哲，於啓聖祠供奉孔子之父、四配之父，以及四位宋代先儒（即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朱熹、蔡沉）之父。

清朝一七四二年——於大成殿供奉四配、十二哲，於崇聖祠<sup>33</sup>供奉孔子之祖先五代、四配之父，以及六位宋代先賢先儒（即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兄弟〉、朱熹、蔡沉）之父。

清朝一九〇六年——於大成殿供奉四配、十二哲，於崇聖祠供奉孔子之祖先五代、孔子之兄、<sup>34</sup> 四配之父，以及六位宋代先賢先儒之父。

臺灣一九七〇年——於大成殿供奉四配、十二哲，於崇聖祠供奉孔子之祖先五代、孔子之兄、四配之父，以及六位宋代先賢先儒之父。<sup>35</sup>

(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關於主獻、分獻的規定）<sup>36</sup>

31 於東廡、西廡供奉的從祀者，大局上始終維持增加傾向，但亦有入祀後遭驅逐者，如宋代的王安石等。

32 此時由宋代以來的名稱「大成殿」改為「先師廟」了。

33 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啓聖祠」改稱「崇聖祠」，並且擴大了所供奉的孔子祖先的範圍。

34 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孔子之兄孔孟皮加入從祀者之列了。

35 《祭孔禮樂之改進》並未言及配享者、從祀者的問題，此時的孔子廟改制中，實際上沿襲了清朝所留下的明細與其配置。後來一九七二年（民國六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舉行一場「孔子廟制（整理孔廟兩廡先哲先賢位次）座談會」，重新研擬應於大成殿、東廡、西廡供奉的從祀者，但增加、撤去或移動神位之事終究未實現。〈孔子廟制（整理孔廟兩廡先哲先賢位次）座談會紀錄〉（中華文化月刊社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5卷第10期，1972，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36 關於此項目，筆者參考王宇清，《歷代祭孔君臣樂舞衣冠考》（1999，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圖表20-21頁、正文53-65頁、137-148頁。其他有關明清時代釋奠禮樂的研究，除前述的黃進興（1994）、林勇成（2002）、杜美芬（2003），還有江帆、艾春華，《中國歷代孔廟雅樂》（2001，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孫瑞金，《祭孔音樂的回顧與前瞻》（200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等。

明朝一五三〇年——皇帝穿用皮弁服；群臣著屬於祭服的青羅衣、赤羅裳，再佩戴朝服的冠、帶、佩、綬；即漢族樣式的衣冠。

清朝一七四二年——皇帝、群臣皆以朝服作為祭服，即滿洲族樣式的衣冠。

清朝一九〇六年——皇帝、群臣皆以朝服作為祭服，即滿洲族樣式的衣冠。

臺灣一九七〇年——遵照「古之禮服」，「參古酌今」設計冕冠、紺衣、纁裳<sup>37</sup>，即漢族樣式的衣冠。<sup>38</sup> 但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舉行釋奠時，因由公職人員擔任正獻官、分獻官，需穿用一九二九年（民國一八）公佈之「服制條例」所規定的禮服。男子禮服即藍長袍、黑馬褂，其造型與配色類似清朝的朝服。<sup>39</sup>



從右向左，正獻官、分獻官的禮服（總統、總統代表、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等亦穿之）、禮生衣冠、樂生衣冠、佾生衣冠。二〇〇八年攝於臺北市孔廟文物展覽室。



「獻官服式」（圖右）與「獻官之冠—冕」（圖左）。載於《祭孔禮樂之改進》17頁。  
(5)釋奠時所演奏的樂曲（音樂與歌詞）<sup>40</sup>

37 「纁」是淡紅色之一種。

38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5-17頁、19頁。

39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9頁。故此，臺北孔子廟（臺北市孔廟）於每年九月二八日舉行釋奠時，正獻官、分獻官並未穿著冕冠、紺衣、纁裳，三獻禮之後升大成殿上香的總統、總統代表、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等公務員亦如此。該書為此等人員規定的衣冠，其實是為將來由民間另行舉辦春季釋奠而設計的。

40 此項目與下項目，筆者參考王宇清，《歷代祭孔君臣樂舞衣冠考》圖表30-32頁、正文121-129頁。

明朝一五三〇年——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制定的「大成樂章」（咸和之章、寧和之章、安和之章、景和之章。）其歌詞源於北宋朝「大晟府」所制定的儀式樂曲，傳至明代後，稍微改變。

清朝一七四二年——昭平之章、宣平之章、秩平之章、敘平之章、懿平之章、德平之章。

清朝一九〇六年——昭平之章、宣平之章、秩平之章、敘平之章、懿平之章、德平之章。

臺灣一九七〇年——洪武六年制定的「大成樂章」（咸和之曲、寧和之曲、安和之曲、景和之曲。）其歌詞源於北宋朝「大晟府」所制定的儀式樂曲，以明代的版本，又作了些微修改。<sup>41</sup>但只有鐘、鼓保留「清代莊嚴的節奏」如此沿襲了清朝的規定。此外，將所有樂器由大成殿內移至殿外的廊上、殿前的臨時露臺上，以為演奏場所。<sup>42</sup>樂生的衣冠是參考〔元〕《宋史》；〔明〕《大明集禮》；〔明〕黃佐，《南雍志》；〔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三禮圖》；<sup>43</sup>《樂學軌範》<sup>44</sup>等，以宋朝、明朝樣式設計的，<sup>45</sup>即屬於漢族樣式。



「大成樂章」樂譜的一部份。載於《祭孔禮樂之改進》12頁。

#### (6)釋奠時所呈獻的佾舞

明朝一五三〇年——只用文舞。跳文舞時持三羽之翟（即有三條翎子的，明朝所規

41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3、9頁、11-15頁。該委員會認為，此樂曲是「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制定的。嚴格說來，其歌詞是根據「嘉靖禮制改革」時部份更改的歌詞而再度修訂的。「嘉靖禮制改革」當時，伴隨孔子稱號自「大成至聖文宣王」改為「至聖先師」，歌詞中將孔子視為「王」的表現也被改成以孔子為「師」的表現；此時的孔子廟改制中，景和之曲中「百王宗師」一處，以「蒙 總統親自批閱」的名義，為配合「時代精神」而被改成「萬世宗師」。該書9頁中講述了此事。

42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3、8、10頁

43 筆者不知，該書是否為〔北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

44 筆者不知，該書是否為〔朝鮮〕成俔等，《樂學軌範》。

45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5、18、19頁

定的舞蹈用具），其衣冠屬於漢族樣式。

清朝一七四二年——只用文舞。跳文舞時持單羽之翟（即有一條翎子的，清朝所規定的舞蹈用具），其衣冠屬於滿洲族樣式。

清朝一九〇六年——因升級大祀，輪替奉獻文舞及武舞。跳文舞時持單羽之翟，其衣冠屬於滿洲族樣式。

臺灣一九七〇年——只用文舞。跳文舞時持「明制」三羽之翟，不用「清制」單羽之翟。舞蹈的動作遵照〔明〕黃佐，《南雍志》。但往時的佾舞宛如體操而呆板不美，因此擴大動作幅度等，以確保舞蹈藝術的美感。<sup>46</sup> 佾生的衣冠參考了〔元〕《宋史》；〔明〕《大明集禮》；〔明〕黃佐，《南雍志》；〔明〕李之藻，《頤宮禮樂疏》；〔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三禮圖》；《樂學軌範》等，以宋朝、明朝樣式設計，<sup>47</sup> 即屬於漢族樣式。



明代釋奠佾舞的衣冠與動作。載於《頤宮禮樂疏》卷八。

(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5)釋奠時所演奏的樂曲、(6)釋奠時所呈獻的佾舞，皆廢除滿洲族皇朝清朝的規定，復原了明朝的規定，以及明朝所繼承的宋朝之規定。(2)給孔子追贈的稱號，似乎也意識到明朝一五三〇年（嘉靖九）前採用的「大成至聖文宣王」，以及一五三〇年後採用的「至聖先師」而更改的，此事自「嘉靖禮制改革」以後，除清代初年之極短時期外，皆未用的「大成」二字中可以窺知。<sup>48</sup> 但「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稱號本身是蒙古人皇朝元朝所創的。通過孔子廟改制的行為，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想要表現的「正當的儒教禮樂（即正當的中華文化）」，似乎就是在往時漢族皇朝

46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4、8頁。

47 改制當初，佾生未用冠，而戴模仿明代童子髮型的假髮，但一九七〇年（民國五九），以容易散亂，不夠整齊為由，遵照〔明〕李之藻，《頤宮禮樂疏》而改用「儒巾（皂巾）」，直到現在。此記錄見於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0、15、18、19頁。

48 國民黨政府早在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四），將孔子嫡系裔孫任命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該委員會規定孔子的新稱號時，也許考慮此先例。請參閱第三節。



所制定之典禮設施、祭祀儀式中保存的禮樂傳統。該委員會如此力圖復古時，尤其是明朝（既是事實上最後的漢族皇朝，亦是未曾於臺灣設置孔子廟的政權）的制度多成為了直接的目標。關於釋奠在國家性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包含「佾舞隊伍的規模」此一個指數），筆者也許可以提出同樣的解釋。「嘉靖禮制改革」以後，明朝就將釋奠列入中祀之一，易言之，撤廢了其接近大祀的禮樂；統治臺灣期間（即一八九五年以前）中的清朝，亦首尾如一地維持其中祀的地位；但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反而將釋奠提升為「大祀八佾」。根據其外表的變化，如此的改制既似乎是摹仿「嘉靖禮制改革」以前的明制，又似是一九〇六年（光緒三二）以後的清制，既然該委員會自己舉出的典據是「宋明以來各種典籍」，筆者就可說，至少該委員會未以清末之制度成為唯一的範本。另一方面，清朝於孔子廟採用的(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5)釋奠時所演奏的樂曲、(6)釋奠時所呈獻的佾舞，就是被視為「錯誤的禮樂」、「來自往時非正統政權的傳統」而遭到廢除。

但應注意的是，此時改制的基本路線是「恢復我國古有禮樂之基礎」且「接近古禮」，<sup>49</sup> 既非清除來源於清朝的要素，亦非復原明朝禮樂。譬如，莊本立氏陸續設計製作據稱是遵照「商周古式」的大型樂器，並且將它與「宋式」木架組合了，<sup>50</sup> 如此的「復古」行為既不符合回歸明朝，亦不符合如實再現其他朝代的禮樂。另一方面，關於上述的六個變數，(3)配享者、從祀者的明細與其配置，是積極繼承或消極默認了清朝統治臺灣期間以來之規定的。譬如，清朝曾將於大成殿供奉的從祀者自「十哲」增為「十二哲」，以此先例為首，由清朝於大成殿、東廡、西廡、崇聖祠追加的任何神位無一撤去。(5)釋奠時所演奏的樂曲，雖然基本上恢復明朝所制定的樂曲，但鐘、鼓卻是「清代莊嚴的節奏」，<sup>51</sup> 來源於兩個不同皇朝的要素被融合為一體。<sup>52</sup>

該委員會沿襲清制的要素，皆非清朝「否定而抹消」明朝規定的部份，或「以滿州族樣式取代漢族樣式」的部份，而只是「單純擴大了物量」，祭祀典禮的本質未有變化。<sup>53</sup> 《祭孔禮樂之改進》以「使殿內的氣氛更為莊嚴」說明將所有樂器由大成殿內移至殿外的廊上、殿前的臨時露臺上的理由，但該書於另一方面流露向當地民眾與海外宣

49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2、20頁。

50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3-10頁。

51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3頁。

52 孫瑞金氏在《祭孔音樂的回顧與前瞻》一篇中，先扼要地評論新制「大成樂章」：「就整個演奏型態分析，卻是一個大雜匯，即樂器—周制，服裝—宋制，樂章名—宋制，樂譜—明制，轉班鼓—清制；」再以音樂學立場將它與明朝原作，以及清朝釋奠樂曲的演奏型態（即調性、前奏、間奏、尾奏等）與樂器使用情形逐一比較。三者異同關係，其實比《祭孔禮樂之改進》中的說明更為錯綜複雜。孫瑞金，《祭孔音樂的回顧與前瞻》61-65頁。

53 這只是筆者在此勉強地分類而已。嚴格說來，追加或削減祭祀對象的行為，就容易使孔子廟所表現之「正當的儒教文化（史）」的內容產生重大的質變。增減禮器或佾舞規模的行為，就往往產生升降釋奠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的結果，亦對孔子廟與釋奠的存在意義造成深刻的影響。在禮樂的小宇宙中，神位、佾生、禮器等之數目的更改，其實不必止於「單純擴大或縮小物量」的變化。

傳釋奠的意欲，對將釋奠的狀況作為電影或電視節目放映之事表示期待。<sup>54</sup>據此可推測，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大概因需要「華麗的舞臺裝置」，所以部份沿襲了清朝大規模且「莊嚴」的孔子廟制度，尤其是釋奠禮樂。該委員會基本上採用明朝所制定的舞蹈動作，卻否定其宛如體操的形象而追求舞蹈藝術的美感之事，也可解釋為志向「劇場化」的改制之一環。相反地，關於(1)釋奠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新制的釋奠雖然稱為「大祀」，但跟隨升級而增加或擴大的對象只有佾舞隊伍，於《祭孔禮樂之改進》缺少關於本來應當同時增量之籩、豆的記述，其理由也許是因為此等禮器於殿內深處陳設，一般觀禮者是看不見的。自明朝（與宋朝）之孔子廟制度的諸要素中尋求「國民黨政府的正當性」，自清朝之孔子廟制度的諸要素中尋求「物量的豐盛與華麗」，而自據稱是來源於商朝、周朝之禮樂的大型樂器中尋求上述兩者，其結果就形成了此時的改制。此是筆者可提出的一種假說性分析，即依據外部觀察所作出的解釋。<sup>55</sup>

對這一種「不純粹」或「模稜兩可」的復古型改制，吾等恐怕也可以根據外部觀察而提出其他各種統括性解釋。但筆者於此更重視，曾擔任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蔣復聰氏，於舉行新制釋奠二日前曾在記者發表會表示：其改制的方針是「溶周、宋、明、清各代文化優點於一堂」的事實。<sup>56</sup> 蔣氏在此發言中，將清朝統治中國大陸與臺灣的期間算入「中華文化」的歷史而未忽視它，並且承認清朝關於孔子廟及釋奠的文化，與周朝、宋朝、明朝同樣具有「優點」。假使該委員會從事的孔子廟改制的目的是根除來源於清朝之要素為方針，如此的改制必定能夠在「抗拒滿州族所留下的記憶，以及沿用清朝禮樂之日本統治期間的記憶」的方面，突顯出國民黨政府的立場，也能夠在「中華文化＝漢族文化」的限定性定義上宣揚「中華文化之復興」或「純化」。但在「以強調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之差異，宣揚我方的正當性」的方面，如此的改制就必定缺乏說服力。因為，暫而不談「批孔」與「尊孔」的對比，當時兩岸之間在「反大清帝國」及「反大日本帝國」的立場上反而充滿共通性。筆者於是解釋，該委員會大概判斷了：按照展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意義（即在意識型態上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對抗），莫若自孔子生於斯世的周朝至擁戴滿州族皇帝的清朝，將所有朝代編入「我五千年來傳統優秀之文化」宏大的故事中，而我方宣布承擔其繼承者、保護者的職責。另一方面，該委員會仍然能確保，清朝於孔子廟這個「硬體」以及釋奠制度這個「軟體」中留下的諸要素中，選擇任何要素以稱為「清朝文化之優點」的自由。

54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20頁。

55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的會議錄、意見書等資料似乎尚未公開，並且管見所及，幾乎未有當時擔任委員的人士言及改制過程之內情的文章或口頭發言，因此筆者難以驗證如此的分析是否恰當。

56 〈至聖先師釋奠典禮 北市昨日舉行預習—明朝樂舞與宋明服裝溶匯於一堂 省垣定今天下午舉行預習〉（《聯合報》1968年9月27日第2版，臺北：聯合報社）。

## 第五節 作為「現代之大祀」的釋奠—國民黨政府有無繼承北洋政府的孔子廟改制？

歷代皇朝的孔子廟制度與釋奠典禮，在皇朝時代於兩岸陸續結束後，依然存續。對於以儒教為國民國家的指導理念，加以宣揚的國民黨政府而言，此等行為是關係到政權之正統性的任務，尤其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開始以後，為了主張自己是「唯一的中國正統政府」，國民黨政府力圖整備孔子廟制度，制作釋奠禮樂，即表現「正當的儒教文化（史）」的典禮空間與祭祀儀式。

但應注意的是，皇朝時代，在以天地、社稷、宗廟（以上皆是大祀的對象）為頂峰的許多國家級祭祀典禮中，孔子廟舉行的釋奠，多半的期間停留在中祀級。易言之，「對天地、社稷、宗廟舉行的儒教祭祀」顯優於「對儒教鼻祖的祭祀」。清朝滅亡後不久，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大總統在中國大陸僅選擇了於天壇、孔子廟、關岳廟（以武神的名義供奉關羽與岳飛）、忠烈祠（供奉殉國者）舉行的祭祀典禮，以為「共和國」的國家級祭祀典禮，制定了其典禮空間與典禮內容。<sup>57</sup> 然後由「北伐」（即與北洋政府抗爭）取代北洋政府，後年再遷臺的國民黨政府，則僅採用了下列的三項，以為國家級祭祀典禮：<sup>58</sup>

- 於孔子廟秋季舉行的釋奠；
- 於忠烈祠春秋二季舉行的「國殤」；
- 於黃帝陵春季舉行的「民族掃墓」（遷臺後，為於忠烈祠舉行的「遙祭黃帝陵」典禮所取代。）

相較之下，可說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典禮設施中，國民黨政府未沿襲天壇與關岳廟，反而將北洋政府未供奉的黃帝列入了國家級祭祀對象。這三項典禮，是分別選取：

- 對指導國民國家思想理念的鼻祖及其繼承者的祭祀；
- 對獻身於國民國家而殉難者的祭祀；<sup>59</sup>

57 政事堂禮制館編，《祀天通禮》、《祭祀冠服制》、《祭祀冠服圖》、《祀孔典禮》（1914，北平：政事堂禮制館）；同編，《關岳合祀典禮》、《忠烈祠典禮》（1915，北平：政事堂禮制館）。

58 一九六八年（民國五七）四月一日，中央政府舉行「成吉思汗大祭典禮」，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代表蔣總統主祭。但其典禮似乎僅為「在臺蒙藏各族同胞」舉行，不宜與此三項祭祀典禮相提並論。《總統府廣報》第一九五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三日）1頁，收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一至六月份（2001，新店：國史館）295-296頁。

59 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八）行政院訂定的「忠烈祠祀辦法」第七條規定了：「忠烈祠應并祀古代名將及革命先烈。」但根據魏如霖氏的報告，當初供奉者「只限於開國以來，忠烈殉職殉難官兵人民。」魏如霖，〈我國武廟沿革與變遷研究〉（《軍事雜誌》第41卷第5期，1973，臺北：軍事雜誌社）31-32頁。



● 對國民共通之遠祖的祭祀。<sup>60</sup>

與皇朝時代位於國家級祭祀典禮之頂峰的「對天地、社稷、宗廟舉行的儒教祭祀」被北洋政府部份廢止，再被國民黨政府完全放棄的同時，皇朝時代位於此等典禮之下的「對儒教鼻祖的祭祀」（即以視覺、聽覺表現「正當的儒教文化（史）」的裝置）被賦予了新意義，<sup>61</sup> 而成為了「現代的大祀」之一。<sup>62</sup>

天壇、孔子廟此二者在皇朝時代已經是舉行大祀的場所，相反地，將所謂「忠烈祠」處於與此等典禮設施幾乎平等的關係之事，可說是由北洋政府所創的。雖清朝曾也擁有供奉陣亡者的設施「昭忠祠」，但於其中舉行的典禮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很低（即比大祀級低二等的群祀級）。與北洋政府相同地，國民黨政府遷臺以前已於首都南京設立了「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與忠烈祠，遷臺以後在改制孔子廟，公佈施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的翌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八），訂定「忠烈祠祀辦法」，於臺灣各縣市興建忠烈祠。<sup>63</sup> 易言之，國民黨政府的忠烈祠制度，在外表上恰似部份沿襲了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國家級祭祀體系之框架，而《祭孔禮樂之改進》所載的孔子廟制度，其實也有與北洋政府共通之處。因此，其典禮空間與祭祀儀式也許是參考北洋政府之孔子廟制度而制定的。<sup>64</sup> 雖然筆者未能在該書中獲得關於彼此影響關係

60 舉行遙祭黃帝陵典禮時供奉的黃帝神位（木主）上，刻有「中華民族遠祖黃帝之靈位」的文字。根據坂元ひろ子（坂元弘子）氏，主張「漢族是黃帝的子孫」的言說，其實是二〇世紀初葉以來，由為打倒清朝而組織「革命各派」提倡的。坂元氏解釋，該黨派自古代傳說中挖掘出黃帝的理由是，將黃帝封為排滿革命（即對抗滿州族皇朝清朝的革命）之民族主義的象徵。與此同時，孔子也以「素王」（即無冕之王，無王位之改革者）的資格由康有為等「立憲君主派」封為其黨派的象徵。坂元ひろ子（坂元弘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體・ジェンダー（中國民族主義之神話—人種、身體、社會性別）》（2004，東京：岩波書店）60-65頁。

61 將「皇朝之祭祀典禮」改為「國民國家之祭祀典禮」的動向，其實是北洋政府早已著手的。如皇朝時代屬於天子特權的祭天典禮，北洋政府則記明「今大總統祭天（，）為代表國民行事。」，並且開放一般民眾在各戶家庭舉行，因此與制定「大總統祀天儀」等官方典禮同時，再制定了十分樸素的「國民祀天儀」。政事堂禮制館編，《祀天通禮》1葉右半葉、11葉右半葉、17葉右半葉。關於祭孔典禮，《祀孔典禮》亦記明：（除仲春、仲秋上丁以外）「其他開學首日（、）孔子生日（，）仍聽各從習慣自由致祭。」政事堂禮制館編，《祀孔典禮》卷首1葉右半葉、同2葉右半葉。

62 嚴格說來，北洋政府所制定的「京師忠烈祠追祭禮」與「京師關岳廟祭禮」，雖皆是由大總統主持，但其簋、豆的數量，以及佾舞隊伍的規模等分別依照清朝的昭忠祠，以及大祀化以前的孔子廟。政事堂禮制館編，《關岳合祀典禮》正文17葉左半葉；同編，《忠烈祠典禮》正文5葉左半葉。

63 魏如霖，〈我國武廟沿革與變遷研究〉31-34頁有詳細的記述。順帶一提，臺中市的孔子廟與忠烈祠在毗鄰左右，二者皆擁有相當壯觀的殿宇，並且由屬於臺中市政府的「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一併管轄。如此光景與二者的地位關係必定是皇朝時代之人難以想像的。

64 北洋政府於《祀孔典禮》中制定「大總統祀孔子儀」「各地方行政長官祀孔子儀」「道尹縣知事祀孔子儀」三等的祭孔典禮，再規定「其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政事堂禮制館編，《祀孔典禮》卷首1葉左半葉、正文16葉右半葉。於是筆者將《祀天通禮》、《祭祀冠服制》、《祭祀冠服圖》等關於北洋政府祭天典禮的文獻與該書一併參考，將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二）、一九一四年（民國三）與一九六八至七〇年（民國五七至五九）的孔子廟改制相較後發現：在筆者於第四節列舉的六個



的證據或旁證，但中野江漢氏在《釋奠》一書中報告：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四年（民國二三）於曲阜舉行祭孔典禮時確實沿襲了北洋政府的祭孔制度，而「民國制定のこの前例に拠つて（遵照民國制定的前例）」執行儀式。<sup>65</sup> 此外，曾擔任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服裝研究組招集人的王宇清氏，對北洋政府所規定的祭祀用衣冠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中國全國上下，因袁世凱違反對孫中山所作實施民主政體之諾言，而恢復帝制，自稱皇帝，被第二次革命推翻，齊罵袁是竊國。但彼所制定之祭服，卻頗能保存數千年傳統之服飾文化，非可否定。」<sup>66</sup>

若北洋政府的遺產果真為國民黨政府的孔子廟制度所繼承，那麼，《祭孔禮樂之改進》中為何毫無關於北洋政府的記述？筆者推測其理由是：該書站在「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孔子廟制度，尤其釋奠禮樂雖然未必是『錯誤的禮樂』，未必悖於『道統』，但非應當繼承的『來自往時正統政權的傳統』，與國民黨政府的『治統』不能相容」的立場，由「特意不提及北洋政府」的態度將它暗示出來。



筆者自己曾以禮生的身份參與臺北市孔廟二〇〇二年、〇五年的釋奠。

變數中，北洋政府的「大總統祀孔子儀」與清末的制度之間，除(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北洋政府未沿襲滿州族樣式的清制衣冠，而設計漢族樣式的祭服）以外，皆無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北洋政府的「大總統祀孔子儀」與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七〇年確立的制度之間，亦有(1)釋奠在國家級祭祀典禮體系中的地位（即自歷代皇朝繼承「大祀」的名義，以及大祀級的典禮規格）、(3)配享者、從祀者的明細與其配置（即未撤去清朝追加的神位）、(4)釋奠時穿戴的衣冠（即設計漢族樣式的祭服）等全部或部分共通之處。現今臺北市孔廟的祭祀對象含有北洋政府一九一九年（民國八）下令從祀的顏元、李燾二位清代先儒。但根據杜美芬氏所指教，此等從祀者的神位是於一九五八年（民國四十七）年以後的某時間以來一直於東廡、西廡供奉的。因此，其出現不必與國民黨政府一九六八至七〇年的孔子廟改制有關。

65 中野江漢，《釋奠》34-41頁。但該書關於此事的記述有些交代不清，譬如在報告「現在行はれて居る祀孔儀節（釋奠）は、民國三年政事堂禮制館長徐世昌氏等が定めた禮制に據つて居る（現在通行的祀孔儀節乃根據政事堂禮制館長徐世昌氏等於民國三年所制定之禮制）。」之後，再敘述「國民政府祀孔典禮は、斯くの如く、面倒ではなく、極めて略式に行はれた（國民政府的祀孔典禮不是如此費時的，而以極簡略的方式舉行）。」筆者不知，此似乎互相矛盾的二句，是否反映當年「家祭」與「國祭（公祭）」的區別。總而言之，當年的家祭動員了八佾舞，並且併用文舞、武舞，而符合清末與北洋政府之規定的事實，值得注意。請參閱注11、64。

66 王宇清，《歷代祭孔君臣樂舞衣冠考》正文160頁。筆者不知，所謂「第二次革命」是否為筆誤。

## 第六節 餘論

於臺北市孔廟二〇〇八年舉行的釋奠，以「欣逢臺北孔廟祭孔禮樂改進，恢復傳統禮樂滿40年」為理由之一，特意「重現大祀規模，以八佾舞行獻禮，祭品擴增為十二簋豆。」<sup>67</sup> 而今年二〇一〇年正值孔子廟改制完成，也就是《祭孔禮樂之改進》出版以來四十週年。在這四十年之間，孔子廟及其祭祀禮樂有兩點值得注目。一、不斷蛻變：經過了四十年，政權透過臺灣孔子廟所表現之「正當的儒教文化（史）」，開始有了與過去（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不同的面貌；<sup>68</sup> 二、變成傳統：「恢復傳統禮樂」以來約四十年的時間，使新的孔子廟制度在當地社會紮根，成熟為一個鄉土傳統。易言之，孔子廟制度不斷地反覆蛻變，以及孔子廟改制逐漸形成一個傳統，都是在這四十年間同步發展的過程。筆者於本文專門分析臺灣孔子廟的過去，但希望今後除繼續研究其往事以外，同時也積極注視其現在與未來。

67 臺北市府新聞稿「紀念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五八週年誕辰 欣逢孔廟修復 神位陞座 釋奠祭禮傳承四〇週年 八佾八音十二簋豆隆重祭孔 有史以來第一位國家元首親自蒞臨上香 大龍峒文化季緊接登場，邀請大家參與儒家六藝文化宴」。

68 如臺北市府依據二〇〇六年（民國九五）修訂的「臺北市弘道祠入祀要點」，於臺北市孔廟儀門東側新設「弘道祠」，以供奉「對大臺北地區的教育、文化有具體卓越貢獻、德術兼備，且逝世五十年以上者」（第三條），同時也創造其入祀典禮的禮樂，引進唐裝、南管樂團等具有「本土」風格的要素；臺北市孔廟二〇〇八年（民國九七）以來，每年舉行「春祭」，宣稱「整個活動自儀程設計、與祭人員規劃、服裝、祝文唱頌、樂舞、祭品等皆融入現代精神」。臺北市府新聞稿〈「春日祭孔·躍動儒風」、臺北市孔廟首次春祭 在古制基礎上創意無窮（採訪通知兼新聞稿）〉（發稿單位：民政局，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順帶一提，四十年來，臺灣孔子廟與中國大陸、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孔子廟之間仍保持著交流、競爭或對抗的關係，而這樣的互動往往隨著時局波動，今日則呈現更加緊密與熱絡的關係。

## 參考書目

1. 〔後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標點本，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 〔北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據「通志堂經解」景印，臺北：大通書局）。
3. 〔元〕脫脫等，《宋史》（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
4. 〔明〕徐一夔等，《（嘉靖）明集禮》（舊題《大明集禮》，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5. 〔明〕李東陽等，《（萬曆）大明會典》（據明朝萬曆年間司禮監刊本景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6. 〔明〕黃佐，《南雍志》（據明代刊本景印，收入「太學文獻大成」，北京：學苑出版社）。
7. 〔明〕李之藻，《頒宮禮樂疏》（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8. 〔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9. 〔清〕張廷玉等，《明史》（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
10. 〔清〕來保等，《（乾隆）大清通禮》（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1. 〔清〕崑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圖》、《（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據清朝光緒二五年刊本景印，臺北：啓文出版社）。
12. 〔民國〕趙爾巽等，《清史稿》（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
13. 〔朝鮮〕成俔等，《樂學軌範》（據〈明朝〉弘治六年朝鮮刊本景印，收入「國語國文學資料叢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
14. 政事堂禮制館編，《祀天通禮》、《祭祀冠服制》、《祭祀冠服圖》、《祀孔典禮》（1914，北京：政事堂禮制館）。
15. 政事堂禮制館編，《關岳合祀典禮》、《忠烈祠典禮》（1915，北京：政事堂禮制館）。
16. 〈至聖先師釋奠典禮 北市昨日舉行預習—明朝樂舞與宋明服裝溶匯於一堂 省垣定今天下午舉行預習〉（《聯合報》1968年9月27日第2版，臺北：聯合報社）。
17. 徐金虎編，《禮俗宗教法令》（1969，臺中：瑞成書局）。
18. 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編，《祭孔禮樂之改進》（1970，臺北：祭孔禮樂工作委員會）。
19. 〈孔子廟制（整理孔廟兩廡先哲先賢位次）座談會紀錄〉（中華文化月刊社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5卷第10期，1972，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20. 臺北市政府新聞稿，〈「春日祭孔・躍動儒風」、臺北市孔廟首次春祭 在古制基礎上創意無窮（採訪通知兼新聞稿）〉（發稿單位：民政局，2008年3月7日）。
21. 臺北市政府新聞稿，〈紀念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五八週年誕辰 欣逢孔廟修復 神位陞座 釋奠祭禮傳承四〇週年 八佾八音十二籩豆隆重祭孔 有史以來第一位國家元首親自蒞臨上香 大龍峒文化季緊接登場，邀請大家參與儒家六藝文化宴〉（發稿單位：民政局，2008年9月26日）。
22.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3冊（198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至十二月份（1988，新店：國史館）。
2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至六月份（1987，新店：國史館）。
2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七至十月份（1990，新店：國史館）。
2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七至十二月份（1991，新店：國史館）。
2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一至六月份（2001，新店：國史館）。
2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七至十二月份（2002，新店：國史館）。
29. 中野江漢，《釋奠》（1935，東京：東亞研究會）。
30. 黃文陶編著，《中國歷代及東南亞各國祀孔儀禮考》（1965，嘉義：嘉義縣文獻委員會）。
31. 魏如霖，〈我國武廟沿革與變遷研究〉（《軍事雜誌》第41卷第5期，1973，臺北：軍事雜誌社）。
32. 黃得時編著，《臺灣的孔廟》（1981，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33. 蘇麗玉，《臺灣祭孔音樂的沿革研究》（198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34. 小島毅，〈嘉靖の禮制改革について（關於嘉靖禮制改革）〉（《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7冊，1992，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35.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1994，臺北：允晨文化出版）。
36. 王宇清，《歷代祭孔君臣樂舞衣冠考》（1999，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37. 江帆、艾春華，《中國歷代孔廟雅樂》（2001，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38. 林勇成，《臺灣地區孔子廟「釋奠佾舞」之研究》（2002，北京：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所碩士論文）。
39. 傅朝卿主編，《閱讀臺灣的孔子廟—孔子廟與臺灣文化資產特展圖錄》（2002，臺



南：臺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

40. 杜美芬，《祀孔人文暨禮儀空間之研究—以臺北孔廟為例》（2003，中壢：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1. 坂元ひろ子（坂元弘子），《中國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體・ジェンダー（中國民族主義之神話—人種、身體、社會性別）》（2004，東京：岩波書店）。
42. 孫瑞金，《祭孔音樂的回顧與前瞻》（200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